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智媒时代影像传播助力文化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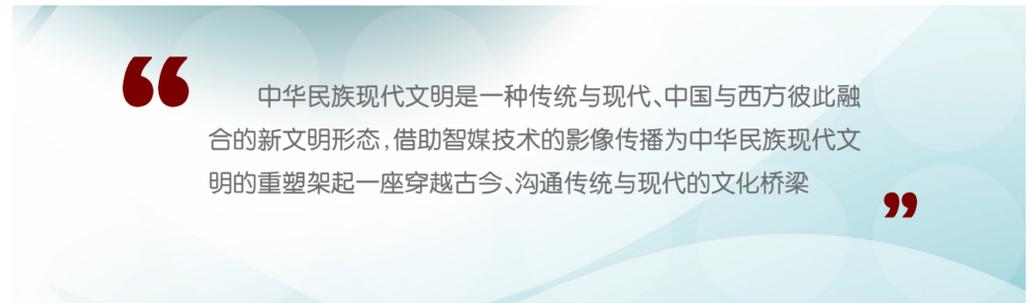
□张慧瑜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智能化媒体借助算法、数据分析、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等改变了文化传播的基本模式。相比大众时代的媒体,智能媒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影像传播扮演着重要角色,信息呈现从文字、图文为主转变为动态化、动画化和视频化的媒介形式;二是智媒的平台化越来越明显,交互性和社交性增强,用户、消费者深度参与到内容生产和传播中;三是数据算法实现精准化传播,一方面对信息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进行大数据收集和分析,另一方面对不同用户进行精细化、个性化内容推送,形成超强的受众黏性。数字影像不仅是搭建虚拟空间的媒介基础,也是沉浸式体验的交互界面。如果说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影视媒体实现了现代传播,那么21世纪中华文明借助数字视听、AIGC(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短视频等智媒时代的影像传播方式进一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数字影像“复活”传统历史文化

电影、电视是20世纪发明的大众媒体,实现了人类从以文字为基础的印刷媒介转向以影像为基础的视听传播。21世纪,视听媒体经历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影像生产、消费的逻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胶片电影、模拟电视转变为数字技术、电脑特效、AIGC为基础的影像生产模式。今年暑期档,有两部国产电影引发热议。一是追光动画耗时10年制作的历史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不仅再现了李白、高适、杜甫等盛唐诗人的浪漫与洒脱,也展现了安史之乱到盛唐到乱世的历史画面。二是历时9年完成的国产神话大片《封神第一部》把中国经典神怪小说《封神演义》搬上银幕,用数字特效呈现了商朝的辉煌与衰亡。这两部作品一方面用影像的方式把传统人物、文化经典数字化为生动、具体的视听作品,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叙事进行了“故事新编”,体现了当代人对历史、对人物的重新阐释,也是把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化产品的可贵尝试。

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哪吒之魔童降世》(2018)等国产动画作品不同,《长安三万里》取材于中国文学史中的真实人物,激活了人们对唐诗的文化记忆。首先,这是一部文学动画电影,把那些朗朗上口的“文字”唐诗《将进酒》《燕歌行》等幻化为活灵活现、亦真亦幻的诗意境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少年李白的自信洒脱、中年李白的肆意妄为以及老年李白的才子迟暮。其次,这是一部以长安为名的动画电影,杜甫等才学横溢的诗人固然留下了美芳千古的诗篇,却终生怀才不遇、无法找到施展的空间。近些年,追光动画公司不仅拍摄了《小门神》(2015)、《白蛇:源起》(2019)、《新神榜:杨戬》(2022)等传统题材的动画片,更重要的是尝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用现代的叙事策略、民族化的动画风格重新



“复活”传统文化,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结合。

神话巨制《封神第一部》也是如此。小说《封神演义》曾多次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是神怪题材的“活水源头”。《封神第一部》借鉴好莱坞魔幻电影的形式,把中国本土的神魔故事变成带有史诗风格、视觉特效的奇幻大片。这部电影在数字特效上下功夫,一方面参考殷商历史文物和考古发掘,在服装、道具、建筑等方面尽量还原商代历史的风貌,制造了“冀州城之战”“建造祭天台”等气势恢宏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用CG动画、AI技术、动作捕捉等把《封神演义》的魔幻、奇崛的魔法展现出来,让神仙、鬼怪变成活灵活现的可视化影像,如数字生物饕餮、饕餮麟和数字角色雷震子等都具有视觉原创性。这部电影还用现代叙事改造神怪故事,把商周之变的红颜祸水、天道轮回变成更符合现代逻辑的人性善恶,以多层次的父与子的对决、认同为情节动力,带有古希腊悲剧的色彩。

近两年,中国传统节日成为电视综艺节目的重要表现内容。2021年河南卫视连续推出“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从《唐宫夜宴》到《元宵奇妙夜》,从《七夕奇妙游》再到《重阳奇妙游》,采用“网剧+网综”的形式把实景舞台与虚拟场景相结合,用舞蹈、音乐和5G、AR技术把七夕、中秋、端午等中国节日“复活”,变成美轮美奂、声动入神的视觉盛宴,既展示了华夏中原文化的古典雅韵,又具有现代视听的节奏和美感,深受青年观众喜欢,屡屡“破圈”。

短视频“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短视频是这个时代影像传播最为重要的形式。依托4G、5G技术,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成为最主要的以影像为主导的传播模式。短视频既改变了影像生产从专业化机构向普通网友的转变,又使得影像变成一种更大众化、更有吸引力的叙事语法。短视频传播有两个特征:一是借助抖音、快手、腾讯视频等平台,亿万网友参与到影像生产中;二是依靠数据算法,短视频推送更加精准,增加了用户的使用黏性。据2023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22年12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亿,占网民比为94.8%。

在短视频创作中,有一类作品非常突出,这就是非遗类短

视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人类文明、文化传统、手工技艺、社会实践的共同遗产。中国作为悠久的文明体,是名副其实的非遗大国,被非遗保护机构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有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1557项,有43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位居世界第一。非遗作品不仅是“躺”在博物馆里陈列和展出,更重要的是变成一种“活生生”的可以传承、可以欣赏的文化传统和技艺。因此,非遗保护特别强调“活化”,影像媒介是非遗传播和“活化”的重要手段。

在短视频平台中,有两种非遗传播的方式。一是非遗网上直播。直播平台可以实现去空间化的传播,如地方戏曲、民族音乐等非遗表演团体,都能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网友领略非遗的魅力。2022年,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51亿,是网络视听行业仅次于短视频的第二大应用。在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上有很多非遗类网红,他们通过网络直播,一方面展示了精彩的非遗艺术,另一方面获得额外收入可以更好地传承技艺。二是展现非遗工艺和制作过程的短视频。这些作品把静态化的非遗变成可视化、动态化的影像,尤其是如木匠、微雕、剪纸、修复古建等技艺类非遗更适合采用这种传播方式。魏生国是糖画手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把制作糖画的过程变成几十秒的短视频,让网友看到糖浆如何在非遗传承人手中变成一幅幅生动、精彩的小动物作品。还有很多文物修复、传统文化保护的短视频,展现了掌握民间技艺的工匠化腐朽为神奇的精湛技艺,这些作品点击率往往非常高,也深受国外网友欢迎。

用影像传播非遗可以实现三重效果:一是让传统手工、技艺、戏曲、民俗等非遗作品保存下来,使得年轻人能从每一个具体的、精彩纷呈的非遗影像中了解传统文化。二是每一个非遗背后不仅能看到一个真实、生动的传承人的故事,也能看出传承人在代代相传中既守正又创新的精神。三是非遗文化具有地方性和在地性,非遗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自然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积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通过短视频平台,非遗传承人及其技艺成为一种“活化”的传统,这对于非遗继承和发扬都有重要作用,使得非遗变成数字时代的文化瑰宝。

古典文论的当代转化(1)

中国学术现代进程开启之时,《文心雕龙》借此东风融入现代进程,从而迎来百年“龙学”兴盛。反思百年“龙学”的现代进程,有许多学理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学科化、课程化推动“龙学”发展

历史地看,“五四”前后新旧两派文化阵营在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对待《文心雕龙》的评价上却比较一致。《文心雕龙》为什么能够赢得两派人士的认同?因为新旧两派都看到《文心雕龙》的丰富内容和重要价值,完全可以与西方的一些经典文论相匹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可见,鲁迅是从中西方各自的文化影响角度来说《文心雕龙》和《诗学》的。胡适也列《论衡》《文史通义》《文心雕龙》为“文学界中三大著作”。作为文化保守派的中坚力量,黄侃对《文心雕龙》情有独钟,其《文心雕龙札记》可谓“现代科学的《文心雕龙》研究”的奠基之作”。在“题辞”中,黄侃称《文心雕龙》“敷陈详核,征证丰富,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这种表述就显然有理论体系的印迹。黄侃是从尊崇传统文化的角度推崇《文心雕龙》,意在证明,西方所谓的逻辑体系,其实中国人早就有了。吴承学指出:“在清末民初,《文心雕龙》仍是传统学者用来捍卫和发扬本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所以,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新旧两派人物尽管各自的立足点不同,但对《文心雕龙》的推崇是一致的。

1923年,梁启超在答《清华周刊》记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读法》中,把《文心雕龙》归为“随意涉览书类”,似乎不是很看重本书。但实际上,梁启超很重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和艺术价值。1925年,梁启超在为范文澜讲疏作序时这样评价《文心雕龙》:“诚文思之奥府,而文学之津逮也。《文心雕龙》用最高于文学特色的赋体写作而成,本身就是经典文学作品。其中确有符合现代科学体系的理论质素。所以,百年来学者们在寻找堪比西方文论的文论典籍时,《文心雕龙》就作为最佳例证被学者们不断提起,从而迎来堪称世纪显学的“龙学”。

《文心雕龙》既然有现代科学的质素,就可以进入现代教育体制,登上大学讲堂,作为一门自成一体的“学问”融入现代学术进程。凭借现代教学机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训练有素的“龙学”研究者,传承有序地传播和弘扬“龙学”文化。

回顾20世纪“龙学”,学科化、课程化大大推动“龙学”的发展。在此之前,人们只凭个人一时兴趣爱好来读《文心雕龙》,随意性较强。成为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后,这就不一样了,《文心雕龙》可以作为教材内容进入课堂,成为有组织、有系统性地开展研究、讲解、学习、传播的对象,这是“龙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大大促进了“龙学”研究的发展。早在20世纪初,章太炎就在日本开设“国学讲演会”,

重建一种“杂文学观”

——从《文心雕龙》“文章学”特质说起

□吴中胜

中国文章学回应社会需求,与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相联系,与日新月异的人文世界相结合。我们有必要重拾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论的实践传统

讲授的内容就有《文心雕龙》。据学者考察,“章氏弟子的记录稿,至今还尘埋在上海图书馆”。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的师生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是黄侃,其《文心雕龙札记》就是“自1914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授课讲义”。其后出现的几部重要的“龙学”著作,也都诞生于课堂教学,后来成为“龙学”学术经典。

《文心雕龙》走进课程教学,为“龙学”不断培养大批知音读者和新生研究者,这是20世纪“龙学”薪火相传、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张之洞说:“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龙学”史上教学相长的佳话比比皆是。20世纪“龙学”研究者可谓师出有门、传承有序,江代有人才出,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们不断把“龙学”推向一个又一个新境界,这充分说明现代教学体制对于“龙学”的巨大作用。

不应以纯文学观念来指摘“文章学”

现代过细的学科划分,也给百年“龙学”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只是单纯地把《文心雕龙》当作文学理论著作来看待,忽视其“文”之概念的宽泛性,从而越来越淡化其文章学的本质特征。

所谓“文章学”,就是研究文章写作规律的一门科学,其中“文章”包含许多应用文体,比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范围要大得多。此前,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章学著作。如吴曾祺撰《涵芬楼文谈》称《文心雕龙》“极论文章之秘”。章太炎主张广义文章学,即凡文字都是文章:“《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为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诸、隐,皆称谓为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他人者也!”章太炎的广义文章学思想是与《文心雕龙》的文章学思想一脉相承的。刘师培也是把《文心雕龙》当作文章学论著,并且认可其文章学思想体系的。他所撰写的《论文杂记》分载于1905年2月间《国粹学报》,有朴社1928年单行本。其中多处引用《文心雕龙》语段以助己论。后来,又撰《说文》分载于1905年12月间《国粹学报》,取法《文心雕龙》,分析字、记事、和声、糅采、宗骚等篇目。黄侃是现代“龙学”研究的奠基人,他对于《文心雕龙》文章学特质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文心雕龙

札记》称《文心雕龙》“兼该众制”,“为笼圈条贯之书”。

对于《文心雕龙》的文章学特质,当时就有一些学者出来“指瑕”。这些学者多为新派人士,他们受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用纯文学的标准去评判《文心雕龙》,认为它的文学定义太宽泛、文体杂乱。如霍衣仙持现代纯文学观念,在谈到《文心雕龙》的“失败处”时说:“文学定义太广泛。”又如,杨鸿烈认为《文心雕龙》全书的所谓“根本缺点”是“使文学的观念,又趋于含混!又使文笔不分!”对于《文心雕龙》的这种“指瑕”,放在“五四”时期,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合理性。但是,站在今天的背景和视野来看,我们又需要对这样的观念进行反思。

重拾中国文论的实践传统

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以西释中”“以西构中”给“龙学”带来不小损伤。今天看来,这种研究倾向最大的不足,就是把《文心雕龙》仅仅当作“文学理论”著作,而忽视其原本是文章学著作的特质。单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它,忽视了其中涵盖面更广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章学特质。王水照先生认为:“以文评著作作为主要载体之我国古代文章学,内涵丰富复杂,却自成体系,最具民族文化之特点。”诚然,《文心雕龙》论述了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但其理论涉猎范围又远远不止今天我们所说的纯文学范畴。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来看,它是一部涵盖要广泛得多的文章学著作。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偏向于纯文学作品,而文章学研究的对象则包含各种文章创作,范围要广泛得多。从纯文学文本入手,《文心雕龙》中许多文体就无法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从纯文学的观念来看《文心雕龙》,往往会轻视其实用功能。《文心雕龙》讨论的文体有的涉及“五礼”“六典”“君臣”“军国”“《文心雕龙·序志》”等军国大事,有的涉及日常生活文体如簿、录、契、券、状(《文心雕龙·书记》)等,也就是说,大到军国大事,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文章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从纯文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文章中许多都缺乏审美功能,都不是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文心雕龙》中许多文体没有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中国文章学久远的实用传统也慢慢疏略了。一些文学作品远离社会生活,越来越成了文人们自我陶醉的文



字游戏。我们有必要重拾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论的实用传统。当然,这种“实用”,不是功利性的“实用”,而是一种与现实人生有着紧密联系的“实用”。

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章学,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也指向社会生活实践。以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为基础,是中国文章学的固有民族特点,中国文章学回应社会需求,与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相联系,与日新月异的人文世界相结合。这跟一些所谓的“纯文学理论”越来越脱离社会生活,甚至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境况大为不同。因此,纯文学理论既涵盖不了中国文章创作的丰富历史,也指导不了中国文章创作的鲜活实践。我们有必要重拾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论的实践传统。

近些年,关于《文心雕龙》文章学特质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学者们关注。学者吴承学认为,在中国文章学史上,最早初步构建中国文章学批评的理论体系的,是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章学。我们需要纠正一段时间以来“龙学”研究的理论偏颇,全面审视它的文章学体系及其特质,从而推进中国文章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重视《文心雕龙》的文章学体系特质,对我们回归历史与现实语境,重新认识《文心雕龙》的思想内容、结构体系、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都有重要的复原性的学术价值。《文心雕龙》是中国固有的文章学体系的本土建构,其“体大思精”的文章学体系和思想观念可以为建构新时代中国文章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思想资源和学理参考,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发挥引领作用。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文心雕龙》与中国文章学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XZW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历史流变及其理论范式构建》(项目编号:22&ZD258)子课题阶段性成果】